

# 國子監訪問記

高厚德 許夢瀛

教育學報第五期單行本

燕京大學教育學會出版

民國二十九年四月

# 國子監訪問記

高厚德 許夢瀛

教育學報第五期單行本

燕京大學教育學會出版

民國二十九年四月



# 國子監訪問記

高厚德 許夢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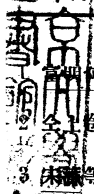
北平國子監，是人人都知道的古蹟，研究中國教育史的，更不能不注意牠。作者近來方從事中國上古教育史之研討，因而決定乘此機會，舊地重遊。

我們擇定九月六號（一九三九）上午從燕大出發，及抵成賢街孔廟門前，快是十一點了。國子監正在孔廟的右邊，院牆毗連，並肩而立，好像是一個機關，確切在過去也往往是「廟監」或「廟學」並稱<sup>1</sup>。

究竟是先有孔廟？還是先有國子監？國子監和孔廟有甚麼關係？爲甚麼把這兩個機關放在一起？單就學校的立場而言，國子監當然是主體。然而在名義上或傳統的思想，孔廟好像比國子監的地位更高。

從唐朝貞觀（AD. 六二七）以後<sup>2</sup>，國學和孔廟就漸漸結了不解之緣。廟與學成了兩位一體，似乎缺一不可。單就現在北平的國子監和孔廟來談，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歷史關係？原來清朝的孔廟和國子監，是因襲元明兩朝的舊規模。按元史說：「大德六年（一三〇三），建宣王廟於京師。十年（一三〇七）廟成，營國子監於西偏。」<sup>3</sup>可見立孔廟在先，建國學在後。再在乾隆三十二年重修文廟碑記上說：「國學始於元太祖置宣聖廟于燕京。由元及明，代有損益修葺。至本朝而崇奉規模大備。列聖右文臨雍，必事輪奐。」<sup>4</sup>

總之或先或後，還不是很重要的問題。我們尤要注意的是二者的關係何在？換句話說，爲甚麼有國學還要有孔廟？這個道理也並不難追究。我們暫不討論孔子爲甚麼最容易受歷代政治當局或皇帝們的歡迎。單就史實而論，孔子向來被認爲是中國文化的創造者，在某一種古書裏面有一段話，可以證明：「五倫爲百行之本，天地君親師，人所宜重，而天地君親之



富明阿等編：欽定國子監志原志凡例頁一

全一卷一頁一

3 林謙等編欽定元史（成宗本紀）卷二〇，頁八

4 富明阿等編：欽定國子監志卷二頁七

義，又賴師教以明，自古師道無過於孔子，誠首出之聖也。」<sup>5</sup> 這是中國「尊師」之說的理論根據。倡導文化，尊重教育，必先尊師，孔子為古今之「師宗」，所以尊崇孔子，就是尊崇教育，所謂「崇師重道」。隨便引個證據來說，譬如雍正二年給國子監祭酒司業的一個訓令：「三月朔日親詣辟廱祇謁先師孔子，行釋奠禮。思以鼓勵羣英，丕隆文治，爾監臣宜嚴督諸生。善為導誘；爾諸生亦當殫心肄業，實踐躬行。秉端方以立身，敦忠孝以興誼。勿營奔競，勿事浮華，文必貴乎明經，學務期乎濟世，俾品成詣進，以副朕教育至意。」<sup>6</sup> 謁先師行釋奠禮本身好像就足以鼓勵學生，盡其提倡教育的能事了。他在另一道訓令裏面還說過：「文廟關繫學術人心，典至重也。宜復宜增，必詳加考證，折衷盡善。」<sup>7</sup> 就這幾句話，已經可以使我們知道，為甚麼有國學必有孔廟。所以在過去，不單皇帝要時常謁拜孔廟，「臨雍釋奠」，照當時國子監的規矩，各監生入監的第一天就要謁敬孔廟，並且隨後還得於每月初一十五，跟着祭酒司業行釋奠禮。現在到內地三家村私塾館裏去，還可以看到在塾師桌案上，供奉着一個孔子神位牌，學生背書或散學回家，都要先向牌位作揖，這較之國子監和孔廟，可以說是具體而微的設置了。

就在孔廟大門口，我們停了一會，來細看門頂上豎立的扁額，上面寫「先師廟」三個字，這是孔廟的正式稱呼（明永樂年間曾一度改作「文廟」）。大概「孔子廟」是最早的稱呼。魯哀公十七年給孔子蓋的家廟就叫做「孔子廟」<sup>8</sup>，唐太宗貞觀四年（六三一）令國學和州縣學設立的孔廟，還稱作「孔子廟」<sup>9</sup>。明朝嘉靖（一五二二）年間曾尊孔子為「至聖先師」<sup>10</sup>，清朝是做照明朝的辦法，所以把孔廟（或文廟）正式定名為「先師廟」，但是普通還是稱「孔廟」或「文廟」的多。

走進院來，我們不及注意那許多參天的古木，就開始查看臚列成行的石碑。我們早已知

5 全上卷首頁十四

6 全上頁十九

7 全上頁二〇

8 王三聘著：古今事物考卷五頁二一（見續知不足齋叢書）

9 全上

10 富明阿等編：欽定國子監志卷首頁一五

道，在這些碑上，刻着歷代學者的姓名。他們都是經過國家最高級考試的成功者。不過現在我們希望挑選幾個，來仔細地研究一下。

很幸運的，在門口服務的嚮導，倒像是一個頗聰明而又很客氣的一位。他給我們的指示和意見，許多是很有幫助的。依着我們的要求，他首先引我們到西邊接近內院入口的地方，看一個殘缺模糊的石碑，上面所記載的時代，相當於公元一三五—，已近元朝的末年。

這裏需要再說明一下，那些碑上所載的學者姓名，一概是參加「殿試」得中的進士。此種考試普通每三年在京城舉行一次，而且是——至少在理論上是——由皇帝親自評閱試卷，借以防止「禮部」主試的私弊，這還是唐代武后的發明呢。<sup>11</sup>

除了發見剛才說過的那個最古老的碑文，我們又借嚮導的協助，從明清兩朝的石碑當中，各找出最早的一個和最晚的一個。並摘錄主要的事實，作全部代表的材料。茲列述如下：

元順帝至正十一年(一三五—)，到京會試成功的，來自國內各地者三百人，還有貴族學校(國子監)的學生(稱生員)參加者一百二十人，共計四百五十名。

明成祖永樂十六年(一四一九)，得進士學位的，共二百五十名。

明思宗崇禎十五年(一六四—)，得進士學位的，共一百六十三名。

清世祖順治九年(一六五三)，得進士學位的，共有五十名，並分爲下列三種等第：

一甲賜進士及第；

二甲賜進士出身；

三甲賜同進士出身。

三甲制度的發生，照宋史的記載，是在太宗太平興國八年(九八四)。<sup>12</sup> 還有一種說法，以爲太宗時只有所謂「及第」，「出身」，「同出身」等名詞，到仁宗才稱爲三甲，<sup>13</sup> 後一種說法似乎缺乏證據，暫不可信。

清德宗光緒三十年(一九〇四)，得進士學位的，共有二百七十三人，也是照上面的三甲制度分列等第。

<sup>11</sup>王三聘著：古今事物考卷五頁二六

<sup>12</sup>托克托等編欽定宋史(選舉志)卷一五五頁五

<sup>13</sup>王三聘著：古今事物考卷五，頁二六

以上不過是一個籠統的說法，實際，在每一個碑上，不僅有各位進士的姓名，還有他們的省縣籍貫。更詳細的也有分成像上面說的三類等級。這種題名紀念的辦法，始於唐代<sup>14</sup>。自唐中宗神龍(七〇五)以後，在杏園宴罷新中第的進士，再到慈恩寺塔下題名紀念。宋朝也採用同樣的辦法，在桂籍堂題名。元明清各朝照例在國子監(或文廟)立碑題名，以作紀念。現在這院裏的石碑，共約一二二通。所抱括的時間，是五一三年。

後來我們又注意到東邊接近內院入口的地方，有一個龐大的古碑，叫做「加號詔書碑」，是明成宗大德十一年(一三〇七)立的。為紀念孔子，特別給他一個身後的爵號——「大成至聖文宣王」。同時對立在西邊路旁，又有一同樣的石碑，是元順帝至正十六年(一三五七)建立的，用以紀念復聖顏子，述聖子思子，宗聖曾子，亞聖孟子等四位。也就是普通所謂「四配」。在這個碑上，每人都給以特別爵號(稱某國公)，所以叫做「加封敕辭碑」。這自然是從前的政治當局提倡儒學的一種手段，不過這種辦法也是從唐朝以來就有的，所不同者僅是爵號名稱的變化而已。譬如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(AD. 八四〇)封孔子為「文宣王」，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(AD. 一〇一三)加封「至聖文宣王」。現在元順帝又改為上面的名稱，到明朝嘉靖年間，改稱「至聖先師孔子」。清朝順治十四年(AD. 一六五八)因給事中張文光的奏請，仍舊稱作「至聖先師孔子」<sup>15</sup>。至於「四配」的名號，歷代常有更改。此刻所謂「復聖」，「述聖」，「宗聖」，「亞聖」都是元朝至順元年(AD. 一三三〇)的定制。

向北走，迎面是一個很壯觀的第二道門(有時也叫做戟門)。門廊下西邊，陳列十個小石鼓，是乾隆五十五年(AD. 一七九一)設置的。這大概是模倣周宣王石鼓的作品。(周石鼓在前幾年，已經運往南京保存了。)石鼓旁邊有乾隆立的一個石碑，大概是關於周朝石鼓的發現，考證和保護的一片話，當我們剛要踏入內院的時候，又看見門頂上的「大成門」三個字。頭兩個字和內院「大成殿」扁額的頭兩個字正相同，(「大成殿」名稱的起始是在宋徽宗崇寧三年(一一〇五))。「大成」的來源，顯然有兩個出處：孟軻讚揚孔子曾經這樣說過：「……孔子之謂集大成，集大成也者，金聲而玉振之也；金聲也者，始條理也，玉振之也者，終條理也；始條理者，智之事也，終條理者，聖之事也。」<sup>16</sup> 第二個出處，似乎是禮記上的學記篇。

<sup>14</sup>全上，頁二七

<sup>15</sup>富明阿等編欽定國子監志卷三，頁五

<sup>16</sup>孟子「萬章」下

(禮記這部書大約在孟子以後，或出於漢代。)學記篇討論教育的話：「……七年視論學取友，謂之小成，九年知類通達，強而不反，謂之大成」。<sup>17</sup>後來追尊孔子的稱呼，常常引用「大成」這兩個字。所以在這裏凡是重要的門和殿，都要連用這兩個字。(在山東曲阜縣的孔廟，也是用這兩個字)正足表示中國學者向來以為這兩個字，含有豐富的意義。

進了大成門，我們立刻注意到很好看的十一個碑亭子，排列在這個大院子前半截的東西兩旁，每個亭子裏面，都藏着一個大的石碑，碑文都是皇帝們對於孔子或儒學的讚頌詞，其中最特殊的，是清代皇帝康熙，雍正和乾隆所立的那三個。

院子北部的重要建築，便是「大成殿」，着實偉大而典雅，可以代表中國最高尚的建築藝術。殿裏陳列很多重要的古代樂器和行禮時的用具，以備定期公祭孔子。關於這些陳列品，我們不願在這裏費詞，因為來參觀的人，都自然會注意到的。

出了大成殿，我們又從西邊不常開的角門，走到大成殿的後院，幾棵老大陰森的古柏，滿地是些野草。再往北有一個小院落，頭門上掛着「崇聖祠」扁額。裏面向南一所正房，陳列孔子的祖先牌位。這個祠原是明朝嘉靖九年(一五三一)建築的<sup>18</sup>，本來叫做「啟聖祠」，專為供奉「聖父叔梁公」的。清朝雍正元年(一七二三)又以王爵加封孔子五代，合祀一堂，改名為「崇聖祠」。

後來我們從前院西邊門，轉入國子監——這是我們此次參觀的真正目的。當時前院見有成羣的工人，地上散布許多建築用的材料，原來是市政府正在修理裏面的房屋，工作還沒完成。我們匆匆掠過，立刻向北走不幾步，進門便是一個大的院落——差不多有二十五畝的面積。就在我們進門相離不遠的地方，有一個華麗無比的琉璃牌樓。是乾隆時代的紀念物。看她的外表，很容易使我們聯想到西山的臥佛寺。牌樓前面有四個大字「圓橋教澤」，正是說明「辟雍」的建築和牠的功用。後面再詳細地談。

辟雍殿正在這個大院落的中心。上面懸掛「辟雍」兩個大字的扁額，恰是一個正方形的殿堂，出簷兩層，四面都是走廊。差不多佔有六丈見方的面積。每一個橫樑豎柱和飛簷的排列佈置，以及其他一切中國式的裝璜修飾，處處代表最上等的建築藝術；而且整個用炫眼奪目

<sup>17</sup>陳澧著禮記集說卷六，頁七三

<sup>18</sup>富明阿等編：欽定國子監志卷八，頁四



的顏色，油漆一過，恰恰立了一個正方形的島上；每邊的長度，大約各有十二丈的樣子。四面有水池環繞，大約有四丈到五丈的寬度。水池的邊沿，一概用白色大理石砌成。彫工極精緻的石欄，依然是很完整。四面各有一個大的石橋，四通八達。

走進辟雍殿，只看見北邊一個講臺，臺上放着一個皇帝的大坐椅，背後是一幅木雕的屏山，此外再也沒有別的重要陳設。

這時候自然要發生疑問：究竟甚麼是「辟雍」？爲甚麼她的建築像上面所說的那個樣子？

對於這問題，向來就有很多不同的解釋。想作一個完善的回答，實在需要把周代以來到現在的中國歷史上有關係的記載，重新澈底研討一番。現在我們只將幾個重要的爭論點提出來。

很明白的，關於辟雍的最早記載，見於詩經文王之什的兩篇歌詞：

「虛業維樅，賁鼓維鏞，  
於論鼓鐘，於樂辟靡；  
於論鼓鐘，於樂辟靡，  
鼗鼓逢逢，辟奏公」。<sup>19</sup>

單就字面看來，似乎說「辟靡」是一種樂器，或者是和樂器有關係的事物。不過向來在中國學術上最有權威的朱熹，竟把牠解作是皇帝的大學，所謂「天子之學」。<sup>20</sup>從漢朝以後，辟靡確切曾經整個的或部分的，當作帝王的大學。辟雍的範圍，內容，以及她和別的幾種制度，究竟有甚麼關係，又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。這裏有關係的名詞，至少有四個。就是「太廟」（皇帝的家廟），「明堂」（皇帝聽政的地方），「太學」（就是大學）和「辟靡」。照過去一般著作家的意見，大致可分爲兩派：一派可由後漢學者蔡邕（A.D.133-192）作代表。他說這四個名詞還是指一個東西說的。他說：「取其宗廟之清貌，則曰清廟，取其正室之貌，則曰太廟，取其堂，則曰明堂，取其四門之學，則曰太學，取其周水圓如璧，則曰辟靡；異名而同事，其實一也。」<sup>21</sup>另一派的代表人物，可算是晉朝的袁準。他認爲這四個名詞，各有所

<sup>19</sup>朱熹著：詩經集注卷六，十九

<sup>20</sup>全上（見註解）

<sup>21</sup>蔡邕著：明堂月令論（見漢學堂經解）

指。換句話說，每一個名詞，都代表一種特別的制度；所以他說：「是故明堂者，大朝諸侯講禮之處；宗廟，享鬼神歲覲之宮；辟廡，大射養孤之處；太學，衆學之居……各有所爲，非一體也。」<sup>22</sup> 其他各家的討論還很多，衆說紛紜，莫衷一是。但至少有一點是大家所公認的：第一，辟雍的功用，是一種高等學術機關，皇帝有時候要到這裏講說經典。第二，辟雍的建築，周圍用水環繞，四面各有橋梁；一般人士都可以站在橋的外邊，看看聽聽；例如文獻通考載：「明帝永平三年……帝正坐自講，諸儒執經問難於前，冠帶搢紳之人，圍橋而觀聽者，蓋億萬計。」<sup>23</sup> 所以這裏辟雍殿前面的牌樓上，有四個大字叫做「學海節觀」，正是這個意思。

關於這個問題的含義，「辟」「雍」兩個字也許多少表示一點。這兩個字各有許多不同的寫法，可以互相借用，彼此解釋。三輔黃圖上說：「辟雍……圓如璧，雍以水，象教化流行。」<sup>24</sup> 蔡邕說：「天子曰辟雍，謂流水四面如璧，以節觀者。」<sup>25</sup> 韓詩說：「辟雍者，天子之學，圓如璧，壅之以水，示圓；言辟，取譬有德，不言辟水，言辟廡者，取其廡和也，」<sup>26</sup> 白虎通上說：「辟者，璧也，象璧圓，又以法天，於壅水側，象教化流行也。辟之言積也，積天下之道德也；雍之言壅也，壅天下之殘賊，故謂之辟雍也。」<sup>27</sup> 唐歸崇敬的解釋：「以制言之，壅水環繚如璧然，以誼言之，以禮樂明和天下云爾。在禮爲澤宮，故前世或曰璧池，或曰璧沼。」<sup>28</sup> 清朝欽定國子監志的編者也有一段綜合的解釋：「廡或作雍，說文無雍有廡，從广，象對刺高屋之形。四方有水曰邕，故從邕，此均以形勢言之也。……或又謂辟者法之自出，本之以爲禮；雍者，和之自生，本之以爲樂，此均以義理言之也。……竊謂，以水而言，當從誰，以宮而言，當從廡，以協和誠和而言，當從雍。周頌曰：『振鷺于飛，于彼西

<sup>22</sup> 袁準著：袁子正論卷下，頁一（見玉函山房輯佚書）

<sup>23</sup> 馬端臨著：文獻通考卷一〇，頁六

<sup>24</sup> 孫星衍校：三輔黃圖頁二八

<sup>25</sup> 蔡邕著：獨斷論卷上，頁七

<sup>26</sup> 韓嬰著：韓詩說（見玉函山房輯佚書卷一八頁二）

<sup>27</sup> 班固著：白虎通，卷之上，頁五十二

<sup>28</sup> 宋祁著：新唐書（歸崇敬傳），卷一，六四

雖。』有聲之詩曰：『鎬京辟廡』。繼又曰：『自南自東，自南自北，無思不服。』可謂深切著明矣。」<sup>29</sup> 此外類似以上的解釋還很多，總之，「辟廡」是很富有「禮樂」或「教化」意義的一個名詞。

今天我們在國子監所見到的辟廡，正和以上大家公認的兩點相合。在那個大空房裏面，北邊一個富麗的寶坐，就是皇帝講經的所在。據我們嚮導說——他的話可以拿牆上和柱子上掛的對聯來證實——清朝一共有三個皇帝，曾經到這裏講過經書。第一個便是乾隆——這辟廡殿就是他創立的。顯明的證據，就是他自己寫的四字橫扁，和三十六個字的豎對，還在屋裏掛着。後來道光皇帝也照例來過一次，留下一掛扁和一付對。第三位來講書的皇帝是咸豐，一如前例。

關於大家公認的第二點——辟雍的建築或外表——也和現在所看見的相合。一進院就可看得很清楚，上面已經敘述過了。

十二點到了，我們就坐在辟雍殿北邊廊下的石階上面吃午飯；一邊嚼着，一邊欣賞眼前的景緻，我們整個被偉大的中國文化包圍了。池濠兩旁雕刻華麗的石欄，走廊上面繪畫如生的龍鳳。前面正北是一排簡樸整齊又全部配置極其合理的房屋。東西兩旁也有同樣的建築，並且各有出自經典的名稱。還有滿院子的古松。處處索引我們的目光，刺激我們的思想，增加我們談話的資料。

吃完午飯，走過橋的北邊，參觀一個正房——院子北部正中的一個房屋——房內懸着「彝倫堂」三字的扁額，是乾隆的手筆，書經洪範篇有「彝倫攸叙」一句話，大概就是這個扁文的出處。此外還有清朝其他皇帝所置的扁額。室內正中立着好幾塊大青石合併成爲一排石碑（大約有十二呎寬）。是康熙三十三年（一六九五）親筆寫的大學第一章行書字，明白易讀。站在孔學和中國舊日教育學說的立場看來，把大學第一章刻成石碑，放在這個很重要的地方，倒覺得合適的。因爲國子監所代表的大學教育理想，正可借此而益加顯著。

室內的北部從東邊到西邊，有很整齊的一長排二十六個大石碑；碑上的字跡很細微，都是乾隆自己寫他對於經書某章句的解釋。二十六個當中，只有一個是用滿文寫成的。

室內西邊，橫臥着三個小長方形的石碑，頗引起我們的注意。其中的兩個是一種歷史記

<sup>29</sup>富明阿：欽定國子監志卷一九頁五

載，對我們的研究很有關係；當時曾經把牠們全部抄錄在筆記簿上。這是康熙五十七年（一七一九）國子祭酒李周望自己作文並書寫。標題叫做「崇實振雅二軒壁記」。我們來研究這個歷史上的制度，心目中自然會發生的問題就是：國子監到了甚麼時候，纔不是一種研究和教學的中心場所，而僅僅成了一種保存經典石碑的地方？現在李周望這兩塊石上的記載，對於這個問題，倒有一點幫助，現在可以引証他一段重要的話，作參考：

「京師爲首善要地，師儒之官，海內圭表，典禮於是乎成，賢才於是乎出，而教習貢監，諸生之執經請益者，旅進旅退，曾無憩息之所，非所以居業也。季試月考，風雨寒暑，授簡摻筆，未及卒業，惴惴焉以禁城鎖鑰爲憂，非所以敬事也。乃於彝倫堂後東廂左右，構二楹，顏其東軒曰崇實，西軒曰振雅。明窗暖室，筆床茶竈，几席籐幕之屬，纖悉異具。諸生校藝角勝，優游歡咏，思夫實則祛名，雅則遠俗，研精覃慮，一一以古人爲準的，而不屑屑於凡近，則尋丈之地，不爲無補焉。又惟人雜而事稠也，更廣葺官舍而鼎新之，使諸司分曹勤事，庶幾各供厥職，無相凌奪之意也。」

照這段碑文的記載，當時大學生們的兩個齋舍，原來都是在國子監後院。我們原想從彝倫堂過庭，到後面查看當時李周望在康熙晚年建設的兩個學生齋舍。因爲過庭門現已封鎖，不能通行。據我們的嚮導說，這些房屋在好多年前坍塌湮沒了。遺址也不容易看到。只留下兩塊石碑，現在前面彝倫堂保存。

我們此刻可以想像到，當時經過彝倫堂後門，便可直接進到這個後院。我們在參觀彝倫堂的時候，偶然轉身到大學石經背後，看見石碑後面刻「君，親，師」三個大字。在一個教育家的眼光看起來，這正足表示在中國固有的思想裏面，教師和皇帝，父親有同等尊嚴的地位。所以特別把這三個字刻在這裏，以便師生往來走過的時候，隨時可以注意。

關於當時國子監的教育活動，上面的碑文，說的相當明白。確切像是真正的一個大學。在康熙晚年還有很多的學生和教授。當時大學生們的日常生活，載在這篇碑文上的，也很生動而有趣味。

另外還有一塊小長方形的石碑，性質和上面說的兩個完全不同。在這塊石碑上刻着很有意思的一位學者蔣湘帆先生的肖像。他曾經作過乾隆的老師，同時還是十三經碑文的寫者——這些石碑現在還貯存在國子監東西廂房裏面。這大概是他晚年的工作。我們也很便宜地買了一張從石上拓下來的像畫。繪畫雕刻，俱甚精緻，表示出這位學者和藹可親的態度。携着

手杖，在風景很好的一塊地方散步。在這塊石碑上，還有他自己題的兩首七絕詩，讀來，可以想見他當時抄寫十三經的生活狀況：

寫經餘晷每陶陶，曳杖開看致自高，  
 爲問蘭亭脩禊日，豈因內史重濡豪？  
 修竹清流尺幅天，杜陵悵望好林泉，  
 他時我亦拈書賣，白髮遙遙藁字仙。」

我們出了彝倫堂，接着考察東西兩排的房屋。在東邊有屋三間，門頂上有一掛扁，寫着「繩愆廳」三字。我們的嚮導說，從前如果學生犯了錯，就在這裏記過。後來參考清朝文獻通考<sup>30</sup>，在順治時代（一六四四）曾經往國子委派「監丞」一官，位置僅次於祭酒，有點像後來的訓育主任。專負糾查的責任。教師如果不盡心教書，學生行爲有不端正的地方，都由他一人來考查記錄。繩愆廳就是他的辦公室。同時西邊對面又有一個博士廳，形式和繩愆廳一樣。按欽定國子監志上記載<sup>31</sup>，清朝國子監的章程，每月十五有一次平時試驗——所謂「大課」；試後的成績卷子，都貯存博士廳。每月又有一次小考（大概在每月的頭十天內）——所謂「堂課」；試卷評定後，也須移交博士廳，轉呈「堂上官」（學校最高當局）。凡校內生——所謂「內班諸生」；各有學業記錄簿，自行記載，每十天，送交主管人稽核，每月初一十五，再由博士廳查驗兩次。這樣看來，博士廳好像現在的教務處。

博士廳的正中間，樹立數塊石碑，而且很緊湊地併在一起，成功一個平面。據嚮導說，是從後院振雅軒移來的。上面刻着一長篇文字，是乾隆五年（一七四一）作的，也是他寫的，內容論到當時一般在校學生對於科舉的態度。

乾隆感覺到當時一般學生，多半希望科舉成名，不能專心研究，所以他說：「科名聲利之習，深入人心，積重難返，士之所爲，汲汲皇皇者，惟是之求，而未嘗有志於聖賢之道。不知國家以經義取士，使多士由聖賢之言，體聖賢之心，正欲使之而爲聖賢之徒，而豈沾沾焉文藝之末哉？」他跟着又引証朱熹的話說：

「朱子云：『非是科舉累人，人累科舉；若高見遠識之士，讀聖賢之書，據吾所見，爲文以應之，得失置之度外，雖日日應舉，亦不累也。居今之世，雖孔子復生，也不免應

<sup>30</sup>曹仁虎等編清朝文獻通考卷六五，頁五四五三

<sup>31</sup>富明阿：欽定國子監志卷一二，頁一

舉，然豈能累孔子耶？」朱子此言，即是科舉中「爲己」之學。誠能「爲己」，則四書五經，皆聖賢之精蘊，體而行之，爲聖賢而有餘；不能「爲己」，則雖舉經義治事，而督課之，亦糟粕陳言，無裨實用；浮僞與時文等耳。故學者莫先於樹志，志於「爲己」者，聖賢之徒也；志於科名者，世俗之陋也。國家養育人才，將用以致君澤民，治國平天下；而囿於積習，不能奮然求至於聖賢，豈不謬哉？朕膺君師之任，有厚望於諸生。適讀朱子書，見其言切中士習流弊，故親切爲諸生言之，俾司教者知所以教，而學者知所以學。

以上乾隆把當時學校教育——特別是國子監——的目的和意義，說的倒是非常詳細懇切。但是國家考試和學校制度，怎樣才能互助爲用，並行不悖，終久沒有解決；到現在這還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。

轉身又到國子監的中院，看一棵富有傳說的古槐。正在博士廳門前，有棵半枯半活的大槐樹。樹北邊的一間屋裏，立着一排石碑，上面刻着乾隆關於這棵古槐的敘述說：「國學古槐一株，元臣許衡所植，閱歲既久，枯而復榮。當辛未一枝再茁之初，適慈寧(乾隆母)六旬萬壽之歲。槐市諸生傳爲瑞事。大學士蔣溥繪圖以紀，曾題六韻卷中監臣觀保等請勒石講堂，垂示久遠；書以賜之。」碑上還刻着乾隆作的一首詩：

「巽宮嘉蔭樹，遺跡緬前賢；初植至元歲，  
重榮辛未年；奇同曲阜檜，靈紀易林乾；  
徵瑞作人化，符祥介壽筵；喬柯應芹藻，  
翠葉潤觚編；右相非誇繪，由來事可傳。」

原來漢朝以後，稱大學也叫做「槐市」，據三輔黃圖<sup>32</sup>上說，漢時長安附近有一塊地方，周圍栽着許多大槐樹；當時的大學生們每月初一十五，都到這裏聚會，各自帶來土產物品，以及書籍樂器之類，互相買賣，同時借這個機會，也可以談論學問。這猶之乎西洋的教育學術機關有時稱作Academy，原來柏拉圖率領弟子朝夕講學的園地叫做Academia。

說起來也很巧，在曲阜縣志<sup>33</sup>上也記載，孔子生前手植的一棵檜樹，到隋煬帝大業十三年(A.D.六一八)也曾經復活過，所以上面的一首詩上有「奇同曲阜檜」之句。

<sup>32</sup> 畢沅校三輔黃圖(補遺)頁五

<sup>33</sup> 潘相編曲阜縣志卷二一，頁一七

隨後又去查看東西廂房貯藏的十三經石刻。兩廡的建築，形式完全相同，都是帶有前簷走廊的平矮房屋。每排各有三十三間，又各分為三組，除了兩間作隔離之用，其餘每組包含十間或十一間。這四間完全封閉。據我們的嚮導說，這四間完全用土填塞，目的是防備火災；如果有一間房屋被火燃燒，這些填塞的房間，就可阻止火災的蔓延。照現在的情形來看，這話似乎合理；畢竟還是疑問。每邊的房屋除了兩間例外，其餘三十一間每間都存放三個刻着經文的石碑；碑上的字全是出自蔣湘帆的書法。每字大小約計一方寸，而且是依照書頁的形式刻在石上，各成獨立的段落。以便墨拓之後，可以裝訂成冊，我們大約計算一下，十三經全文大約共有五四八六〇〇個字，假若蔣先生每點鐘能寫三百個字，每天寫四小時，全部工作需要四百五十六天纔能完成。

究竟這些房屋在沒有當作碑文貯藏室以前，是作甚麼用的？倒是一個有趣的問題。

原來東西兩排遙遙相對的六組房屋，門上各懸一隻扁額，都富有歷史和文學的意味。第一對東西互照的兩隻扁額，一個叫做「率性堂」，一個叫做「修道堂」。這「率性」和「修道」四個字顯然是來自中庸上的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。」的兩句話。第二對東西相映的兩隻扁額，叫做「誠心堂」和「正義堂」。大學上有：「心誠求之，雖不重，不遠矣。」這大概是前一個名詞的出處。禮記樂記篇有「仁以愛之，義以正之。」的話，大概是後一個名詞的來源。第三對東西相照的兩隻扁額，叫做「崇志堂」和「廣業堂」，這兩個名詞的出處是尚書周官篇載的：「功崇惟志，業廣惟勤。」

這六堂還是明朝的遺物。元朝行的是「三齋」制，大體做照宋朝的「三舍法」，不在這裏多說。據春明夢餘錄上說：「洪武元年初設祭酒等官，掌教六堂，曰率性，修道，誠心，正義，崇志，廣業六堂。」<sup>34</sup>並且說：「六堂乃諸生肄業之所。」再在欽定國子監志上載：「順治元年（一六四四）定國子監條規：朔望日，祭酒司業率屬員諸生，拜謁聖廟，行釋菜禮，後升堂講書，祭酒司業及六堂講四書，性理，通鑑；博士講五經。」<sup>35</sup>又在同書裏面載明六堂是當時助教，學正，學錄的辦公室。可見明清兩朝國子監的講堂就是這個六堂。

不過明朝的六堂，表面上雖是六個班級，實際上等於三個年級。並且第一二年級各以一年半計算，這是和現在不同的。譬如說：「凡通四書未通經者，居正義，崇志，廣業。一年

<sup>34</sup>富明何等編欽定國子監卷一二，頁三三

<sup>35</sup>全上，頁二

半以上，文理條暢者，升修道，誠心。又一年半經史兼通，文理俱優者，乃升率性，升至率性乃積分。……歲內積八分者為及格，與出身，不及格者仍坐堂肄業。」<sup>36</sup> 從這段記載可以知道當時國子監的修業年限，除去留級者例外，一共是四年。從入學到畢業，總共升級兩次。我們還可以知道當時最高級（第三年級）的學生一定很少。

到清朝便大不同了。從順治元年（一六四四）國子監的學生就有「內班」和「外班」之稱<sup>37</sup>。前者像現在的「住宿生」，後者像現在的「走讀生」。各以若干名平均分配六堂，並沒有程度上的差別，而且各生的修業年限，也極不一致。學生的來源又頗複雜，有的稱貢生，有的稱監生<sup>38</sup>。貢生又分為六種：歲貢，恩貢，拔貢，優貢，副貢，例貢；監生又有恩監，廩監，優監，例監。就修業年限（坐監期限）來說，最長的是二十四個月（如「例監生」），最短的是三個月（如「副榜准貢生」），其餘為八，六，十四，十六個月不等<sup>39</sup>。

自入清以來，政府對於六堂可以說不大注意，因之國子監的本色，漸漸失掉，遠不如明朝的六堂整飭。譬如據明史選舉志的記載：「入國學者通謂之監生，其教之之法，嚴立規條，每旦祭酒司業坐堂上，屬官自監丞以下，以次序立。諸生揖畢，質問經史，拱立聽命。惟朔望給假，餘日升堂會講，復講，背書，輪課以為常。」<sup>40</sup> 當時國子監的嚴整氣象，可想而知。明太祖實錄載洪武十五年（一三八三）頒布國子監學規第二項如下：

「背誦日期：初一：假；初二初三：會講，初四：背書；初五初六：復講；初七：背書；初八：會講；初九初十：背書；十一：復講；十二，十三：背書；十四：會講；十五：假；十六，十七：背書；十八：復講；十九，二十：背書；二十一：會講；二十二，二十三：背書；二十四：復講；二十五：會講；二十六：背書；二十七，二十八：復講；二十九：背書；三十日：會講。」<sup>41</sup>

這簡直是一張很清楚的日課表，每月只有兩天假期。

36全上，卷一三，頁三三

37全上，卷一一，頁二

38全上，頁一

39全上，卷一二，頁二

40全上，卷一二，頁三二

41全上，卷一二，頁三四



一到清朝，國子監便入了厄運！自從雍正年間（一七二三）設內外班的制度，就有一半學生不住監內。平時講課又很鬆懈。譬如康熙三十一年（一六九三）有一次禮部的議決案：「國子監季考月課，雖有成例，恐日久廢馳，嗣後祭酒司業務躬為督課，分別獎勵，每月朔望令滿漢監生，齊集講書，如視為具文，不實心舉行者，從重議處。」<sup>42</sup>可見在這個時期連每月兩次的講書和小考，也不好維持了。再拿歷年住監的學生數來看更易明白：

雍正年間（一七二三）的情形：「內班定額一百三十名，並在監南學學舍居住，外班定額一百二十名，在外僦寓。每月赴監應課，內外班共計二百五十名。」<sup>43</sup>

乾隆三年（一七三九）的情形：「兼管監事尚書趙國麟奏准，請將外班一百二十名額數裁去，止留內班一百八十名，俾諸生安心肄業。」<sup>44</sup>

乾隆六年（一七四五）的情形：「兼管監事尚書劉吳龍奏准……請於內肄業一百八十缺之內，撥出二十四名作外肄業缺，計其公費可給百二十人。」<sup>45</sup>

嘉慶二年（一七九八）的情形：「禮部覆准八旗及大宛肄業貢監生，概不准補內班。」<sup>46</sup>

就以上的情形看來，國子監的學生額數變化得很厲害。拿乾隆三年住監人數最多的時期來說，只有一百八十名；不過同時將外班完全裁去，後三年又減剩一百五十名。嘉慶二年連內班也完全取消了。以後所謂國子監生就慢慢僅成為名義的了。

再到同治年間，學規更其廢弛。下面的記載，又可以證明：

「同治二年（一八六四）諭：內閣御史劉毓楠奏請整頓各學教習等語。據稱滿漢各學設立教習，統于國子監，現充教習者，傳補後，並無生徒肄業，期滿僅尋數人赴監，謂之交功課，其實並無功課可交，即可得官，各等語，著國子監堂教官查明認真整頓。稽覆功課之勤惰，分別勸懲，毋得有名無實，敷衍了事。」<sup>47</sup>

可見同治二年以後的國子監，已經是名存而實亡了。因為不但平時肄業期間，各監生不

42全上，卷一二，頁八

43全上，卷一一，頁二

44全上，卷一一，頁一二

45全上，頁一三

46全上，頁一六

47席裕福著皇朝政典類纂，卷二一八，頁四

曾到校受課，臨到卒業的時期，也沒有一點成績可交。

話又說回來了，現在六堂的石碑究竟是甚麼時候立的？據欽定國子監志<sup>48</sup>的記載，先是蔣湘帆的十三經手抄本，在乾隆五十七年（一七九三）以前已經完成。同時就令採石招工，從事雕刻，一共費了三年工夫，乾隆六十年（一七九六）曾親到國子監舉行工竣典禮。並且還作詩紀念，〔辭源上說這些石碑是在嘉慶八年立的，恐有錯誤。〕

我們看完了貯存十三經碑文的東西廂房，又注意到院內的三個碑亭。西邊的一個是乾隆四十三年（一七七八）寫的「三老五更說」。內容討論古代養老的禮節。關於這種制度，向來有許多傳說。禮記的文王世子篇和樂記篇都有此項記載，而且是皇帝自己主持的。自漢而後，以乎不斷舉行這種禮節，一方面是皇帝的特權，另一方面又往往和國子監或太學發生關係，常常是皇帝親到太學，對三老五更行崇拜禮。在這碑文上，乾隆極端反對國子監有此項功用。他認為三老五更純是荒誕不經之談。

在東邊還有一個碑亭，是乾隆五十年（一七八六）立的。在這個碑上，乾隆又舊調重彈，發了一長篇關於三老五更的議論。說他二十八歲的時候，曾向大臣鄂爾泰張廷玉討論恢復太學養老的古禮，因為張的反對，遂作罷論。四十年後忽然在舊檔案裏面，發現張廷玉關於三老五更的奏文，和他晚年的主張正相同。所以太學養老的制度，在清朝始終未曾恢復。

還有一個「辟雍建築工竣紀念碑」，放在第三個亭子裏面。據上面乾隆的碑文說，自從元朝在這裏設置國子監，當中經過明朝一直到他的時代，差不多有五百多年的長時期，僅有國子監，而無辟雍。他說這是「名實或不相稱」。意思是說有國子監，同時也必須有辟雍，所以在一七八三年的春天，就下令建築辟雍，一七八四年曾到國子監查看工程，一七八五年又到國子監主持工竣典禮。他的理由是：「稽古國學之制，天子曰辟雍，所以行禮樂，宣德化，昭文明而流教澤，典至鉅也。」<sup>49</sup>按前面所說的彝倫堂，本來就是皇帝講書的地方。但是他說：「彝倫之堂，可謂之學，而不可謂之辟雍，以天子講書於彝倫堂，可謂之視學，而不可謂之臨雍。」<sup>50</sup>原來大戴禮上有帝入東學南學北學太學的話，以為周朝京內一共有五學，正中的一個就是辟雍。現在國子監的辟雍殿，很顯明地表示出此種意思。

<sup>48</sup>富明阿等編：欽定國子監志，卷首，頁一五

<sup>49</sup>曹仁虎等編清朝通典，卷五六，頁二四〇〇

<sup>50</sup>富明阿等編：欽定國子監志，卷一九，頁七

前面已經提到過，在我們參觀和參觀以後的研究當中，心裏不斷發生一個重要問題；國子監本來是一個國立大學或教學的機關，後來一變而為十三經石刻的貯藏室，就僅僅成歷史上的名詞了；這是甚麼原因？怎樣變化的？究竟是在甚麼時候？據以上的敘述，此刻可以暫作如下的結論：

第一，科舉制度，本是容許而且獎勵私人研究，但是後來差不多在一千多年當中，對於純粹以教學為目的的學校，漸漸發生壞的影響，甚至有壓倒學校的情勢。上面乾隆在一七四一年所發的一篇議論，很可以表示在他的時代，國子監正受此種壓迫。

第二，本來在元明兩朝，國子監學生照例須住監聽講。清初以來，漢族學生准許在家裏肄業，平日也不常到校受課，只是每月初一十五到國子監，跟着祭酒司業舉行祀孔（釋奠禮）。此外祭酒每三個月有季考一次，司業每月有月考一次，便算完事。這樣一來，六堂房屋自然沒有甚麼用處，加以乾隆晚年急於要完成他的十三經石刻之偉大計劃，因而索性就把六堂當作十三經石碑的貯藏室了。

第三，在皇朝掌故彙編裏面記載。同治元年（一八六二）曾向國子監下過一道命令：「嗣後於應課詩文外，兼課論策，以經史性理諸書命題，用規實學。著該祭酒等，督飭各堂助教，學正，學錄，分日講說，獎勵精勤。」<sup>51</sup>可見這時候的國子監，還是一個講學的地方。但是再看上面引証同治二年（一八六四）的學諭，可以想見當時國子監的蕭條。我們還要知道，同治元年已經有中國第一個新式學校——同文館<sup>52</sup>應運而生。同治二年又有上海廣方言館<sup>53</sup>的設立，五年（一八六八）有福建船政學堂<sup>54</sup>，六年（一八七〇）有算學館<sup>55</sup>，以後便是所謂學堂新教育的世紀了。現在似乎可以假定地說，在一七九〇到一八七〇的幾十年當中，國子監已經漸漸失掉本來的特性，不能算是真正的一個國立大學了。直到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〇六）學部<sup>56</sup>成立，遂取國子監而代之。

51 張壽鏞等編：皇朝掌故彙編，卷三八，頁四七

52 全上，卷三九，頁一

53 全上，卷四〇，頁一

54 陳青之著：中國教育史，下冊，頁五六三

55 張壽鏞等編：皇朝掌故彙編，卷三九，頁一

56 丁致聘編：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，頁一五